

杨念群《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
的理论基础与基础
孙致论克尔·德菲尔·夏姆拟述文体的哲学意义
陈伯大帕利坎与他的《教义发展史》
梁寿华超越信仰的社会实效性
美国文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必然衰退吗？
潘世福高厚茂《圣经教义传要录》初步诠释
法雷尔·超越奥古斯丁的神义论
柏特凯恩卡姆的政治理论
陈翰“成圣中”的基督

王晓朝从拉丁神学的成长看基督教学者
在文化转型中的地位

李富Ousia, Homousia和Hypostasis

黄慧贞从西方“妇女宗教精神”运动

到亚洲基督教妇女神学的反省

姚西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要派

福音民、郑寅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罗马教廷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关系

张洪胜译Peter Beyer的《宗教与全球化》

张天德译孙小千《“迦拿斯”译为“道”》

杨念群《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
的理论基础与基础

孙致论克尔·德菲尔·夏姆拟述文体的哲学意义

陈伯大帕利坎与他的《教义发展史》

梁寿华超越信仰的社会实效性

美国文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必然衰退吗？

潘世福高厚茂《圣经教义传要录》初步诠释

法雷尔·超越奥古斯丁的神义论

柏特凯恩卡姆的政治理论

陈翰“成圣中”的基督

王晓朝从拉丁神学的成长看基督教学者

在文化转型中的地位

李富Ousia, Homousia和Hypostasis

黄慧贞从西方“妇女宗教精神”运动

到亚洲基督教妇女神学的反省

姚西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要派

福音民、郑寅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罗马教廷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关系

张洪胜译Peter Beyer的《宗教与全球化》

张天德译孙小千《“迦拿斯”译为“道”》

杨念群《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
的理论基础与基础

孙致论克尔·德菲尔·夏姆拟述文体的哲学意义

陈伯大帕利坎与他的《教义发展史》

梁寿华超越信仰的社会实效性

美国文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必然衰退吗？

潘世福高厚茂《圣经教义传要录》初步诠释

法雷尔·超越奥古斯丁的神义论

信仰与社会

FAITH AND SOCIETY



王晓朝 杨熙楠 主编

杨念群《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
的理论基础与基础
孙致论克尔·德菲尔·夏姆拟述文体的哲学意义
陈伯大帕利坎与他的《教义发展史》
梁寿华超越信仰的社会实效性
美国文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必然衰退吗？
潘世福高厚茂《圣经教义传要录》初步诠释
法雷尔·超越奥古斯丁的神义论
柏特凯恩卡姆的政治理论
陈翰“成圣中”的基督

王晓朝从拉丁神学的成长看基督教学者
在文化转型中的地位

李富Ousia, Homousia和Hypostasis

黄慧贞从西方“妇女宗教精神”运动

到亚洲基督教妇女神学的反省

姚西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要派

福音民、郑寅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罗马教廷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关系

张洪胜译Peter Beyer的《宗教与全球化》

张天德译孙小千《“迦拿斯”译为“道”》

杨念群《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
的理论基础与基础

孙致论克尔·德菲尔·夏姆拟述文体的哲学意义

陈伯大帕利坎与他的《教义发展史》

梁寿华超越信仰的社会实效性

美国文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必然衰退吗？

潘世福高厚茂《圣经教义传要录》初步诠释

法雷尔·超越奥古斯丁的神义论

柏特凯恩卡姆的政治理论

陈翰“成圣中”的基督

王晓朝从拉丁神学的成长看基督教学者

在文化转型中的地位

李富Ousia, Homousia和Hypostasis

黄慧贞从西方“妇女宗教精神”运动

到亚洲基督教妇女神学的反省

姚西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要派

福音民、郑寅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罗马教廷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关系

张洪胜译Peter Beyer的《宗教与全球化》

张天德译孙小千《“迦拿斯”译为“道”》

杨念群《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
的理论基础与基础

孙致论克尔·德菲尔·夏姆拟述文体的哲学意义

陈伯大帕利坎与他的《教义发展史》

梁寿华超越信仰的社会实效性

美国文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必然衰退吗？

潘世福高厚茂《圣经教义传要录》初步诠释

法雷尔·超越奥古斯丁的神义论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信仰与社会

FAITH AND SOCIETY

王晓朝 杨熙楠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获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道风书社)授权出版简体字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5-18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与社会/王晓朝,杨熙楠 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

(西方学术与汉语思想前沿丛书)

ISBN 7-5633-5776-9

I. 信... II. ①王...②杨... III. 基督教-信仰-宗教社会学-文集 IV. B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496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编:276017)

开本:650mm×960mm 1/16

印张:22.5 字数:264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编者导言

道风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95年,今年是一个喜庆年。在这十年中,研究所鼎力推动汉语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同类学术机构无法替代的角色,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工作特点。十年来,研究所充分自觉地发挥着学术平台的功能,努力联络、沟通国内外、东西方、教内外、多学科的学者,相互交流,共同研究,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为了纪念建所十周年,我们精选研究所近年来的优秀文章,汇编成书出版,以飨读者。

论及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环境与现在有什么不同,用“十年巨变”这四个字来描述想来不会有人反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已经驶入快车道。据有关专家分析:1999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居108个国家的第64位,中国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的差距在缩小。如果保持1990—2000年平均发展速度不变,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大约在2015年前后将达到100%。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天津、上海、香港、澳门和台湾等6个地区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已经超过世界平均值,达到或超过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00年,香港和澳门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北京、天津、上海和台湾处于从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的过渡期,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4个地区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成熟期,黑龙

江等 15 个地区处于发展期,安徽等 9 个地区处于起步期。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十多年以前,中国人还在为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进行激烈的争论,而现在人们希望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便更好地融入整个国际大家庭,更好地参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十多年前,中国社会的一切还在围绕着经济活动转,其他方面遭到忽视,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活动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要一起抓,要“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十多年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坐拥科学的地位,而哲学和人文学科很难取得应有的地位,而现在它们的处境有了重大的改变,政府已经提到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完成转型的过程。经济、政治、社会方方面面的改革和中国社会带来的生机,也使人们面对陌生的生存环境,面临较以往更大的机遇、挑战和风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竞争机制的引入,在人们生活质量大幅提高的同时,也使人们感受到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现代化不仅带来了人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人的精神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中,个人自由度的增大必定会产生精神需求的多样化,信仰追求的多样化。追求适合自身需要的精神生活,探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关注终极实在和超越自我,这是人类普遍的精神指向。正是这种精神需求使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人的终极关怀问题、人的有限性问题、人的自身认同问题,以及人的生死及死后归宿问题等等,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中国人也不能例外。即使中国完全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这些问题也会以较尖锐的形式和面貌出现。

现时代中国民众精神需要的日益增长,就是进一步推进和加强汉语学术研究的合理性所在。研究所在以往处境下取得的研究成果(翻译、交流、创作)对于发展与促进中国内地学界的学术研究,乃至促进一般的文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有着深刻的影响。它虽然不像中国上世纪90年代若干次重大思想讨论——后现代、人文精神、市民社会、全球化、自由主义、社会公正、经济伦理、思想创新——那样显赫,但它的影响将更加深远,因为它直指人类的共有精神价值,直指人心。

从整个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来看,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全球化问题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重点,“在解释世界各地影响深远的很多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方面,全球化已成为强而有力的指导观念。有关全球化过程与影响的辩论,更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进行。学者们普遍同意,经济国际化的趋势与大众消费全球化的潮流显而易见”。与此同时,“国际企业精英文化”、“全球通俗文化”、“全球学术精英文化”、“通俗宗教文化”这四种文化全球化现象同时发生,彼此息息相关,而且跟本土文化互动。^①

在这样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大趋势下,中国学术界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关系。“实际上‘全球化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司空见惯的对于人类当前状况的特征表达,尽管并非没有问题。在这方面,许多学科在有关传统、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性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争议。事实上,要想描绘全球性的整体轮廓而不把它置于(用当前的术语说)这一系列主题中,并不是完全可能的。同理,我们也不可能忽视与全球性有关的本土性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关

^① Peter L. Berger & Samuel P. Huntington, ed., *Many Globalizations: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2002. 杭廷顿、柏格主编:《杭廷顿与柏格看全球化大趋势》,台北:时报出版公司,2002,页38。

于全球化以及最近几十年来所谓现代性的相关问题的论争中,这二者经常被(尽管是非常简单地)看作是相对的。”^①

在全球化大趋势下的中国学术研究应当摒弃全球性与本土性根本对立的观点,它将把 Globalization(全球化)这个词当作背景描述用语,而用全球性(Globility)和本土性之统一来展望中国学术的未来。中国学术界在未来的发展中不应主张用“全球文化取代本土文化”,也不应主张用“本土文化强力排斥全球文化”,它的主张接近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互动所产生的“全球一致的文化跟特定的本土文化融合”。简言之,中国学术界应当超越以往僵硬的东西方文化的两分与对立。

当今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东西方文明之间,仍旧存在着许多隔膜与误解、冲突与仇恨。如何使冲突变和谐,从对抗到对话,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因为许多误解与冲突、友谊或融洽,都已经由历史中的交流与文化积淀造成,异域形象已成为传统的一部分。“约五百年来,欧洲和这片被世人称为西方的非现实的星云占据了世界的舞台,今日被美国这个超级星座操纵的西方,就像一片异常强大的星群,将其变幻不定的光芒投身在它的周围,遮蔽了人类历史的各个领域,不给其他演员施展的余地。”^②然而,不管是西方的中国形象还是中国的西方形象,都不仅是对异域文明程度不等的真实反映,而且也是本土文化根据自身的传统模式进行重组、重写,渗透着本土情感与观念的创造物。因此,异域形象,既有真实,也有虚构;既能反映异域文明,也能表现本土文化精神。要想破除这幅被东西双方歪曲了的世界图像,仍需东西方学者的共同努力。

① 罗兰·罗伯逊:《西方视角下的全球性》,载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20。

② 李比雄:《欧洲何时从白日梦中警醒?》,钱林森、李比雄、苏盖主编:《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

目录 *contents*

杨念群	“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 的理论及组织基础	1
孙 毅	论克尔恺郭尔复调叙述文体的哲学意义	48
陈佐人	帕利坎与他的《教义发展史》	65
梁寿华	超然信仰的社会实效性	88
关启文	宗教在现代社会必然衰退吗?	120
潘贝頔	高母羡《辩正教真传实录》初步诠释	153
法雷尔	超越奥古斯丁的神义论(陈建洪译)	174
米特凯	奥卡姆的政治理论(朱雁冰译)	181
陈 榆	“成形中”的基督	211
王晓朝	从拉丁神学的成长看基督教学者在文化转 型中的地位	233
章雪富	Ousia, Homoousia 和 Hypostasis	250
黄慧贞	从西方“妇女宗教精神”运动到亚洲基督徒 妇女神学的反省	275
姚西伊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基要派	288
顾卫民、郑寅达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罗马教廷与意德法西斯 政权的关系	313
张洪胜	评 Peter Beyer 的《宗教与全球化》	336
张庆熊	读孙小平《“逻各斯”译为“道”》	349

“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与组织基础^{*}

杨念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中国基督教的“社会福音派”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流派,这一派特别强调把基督教的种种教义与中国民间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加以贯通式的理解,使基督福音借助世俗化的手段在中国社会中逐步具备本土化的特征,从而真正在日常生活层面而非精英化的层面对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施加影响。“社会福音派”思潮的外化形式就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波及全国的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本文不打算面面俱到地描述“社会福音派”与乡建运动的形成历史,而是想从当时遗留下来的相关文献中抽取出这场运动与社会、国家、政治错综复杂的因缘关系加以评说,并尝试分析“社会福音派”的行动纲领与实施程序在面对这种多元影响时所产生出的内在紧张及其相关的回应方式。

^{*} 本文为作者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道风研究基金”支持的旅港研究期间完成的论文。作者感谢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邢福增、梁家麟博士在资料收集方面提供的诸多帮助。

一 “社会福音派”与耶稣形象的重塑

所谓“社会福音派”的历史起源,按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大致可定位于美国 19 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美国学者认为,“社会福音派”的产生是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直接产物,美国基督徒试图运用基督教思想处理 19 世纪中叶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从而号召基督徒应采取面向社会的工作形式以完成重构社会的使命。实践这一设想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 1872 年成立于波士顿的“基督教劳工协会”(Christian Labor Union),协会提出了一系列如缩短工作日的变革要求。^① 对“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这一术语进行完整的体系性解释的著作,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家 R. Ely 于 1889 年写成的《基督教的社会方面》,在这本著作中,他主张教会必须放弃狭隘、顽固的个人化的态度,放弃拯救灵魂时局限自己视野的观点。“社会福音”要求不间断地攻击每一个产生谬误的机构,直到人间变成上帝之城。^② 书中已明确区分出“社会福音”理论与基要派的“个人拯救”(individual salvation)理论之间的区别。

本世纪初,把基督教应用于社会已成为美国教会的共识。正如尼布尔(H. R. Niebuhr)在 *The Kingdom of God in America* (《美国的上帝之国》)一书中所示,上帝之国的观念在美国基督教中一直具有核

^① 有关“社会福音派”之起源的详细讨论,可以参阅 C. H. Hopkins, *The Rise of the Social Gospel in American Protestantism, 1865—1915* (《美国新教中社会福音派的崛起, 1865—191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0。又见 L. D. Kessler, 《社会福音与基督教对中国的冲击: 江苏东部教会的一个个案研究》, 载林治平主编: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台湾: 宇宙光出版社, 1994, 页 594—595。

^② 同上。

心的地位,但在现代,它已被等同于地上之国,等同于一种社会秩序。^①按照麦奎利(J. Macquarrie)的划分方法,美国的社会福音派有三大派别,分别由格拉顿(W. Gladden)、饶申布士(W. Rauschenbusch)和马休斯(S. Mathews)为代表。^②在这三类“社会福音派”神学家中,根据历史记载考察,只有饶申布士的思想在中国一度风行并广有影响。1923年广学会出版了张仕章翻译的饶申布士(张译为饶习博)所著《耶稣底社会原理》一书,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社会福音”理论的最早、也是当时最为完整的中文介绍和表述。据我观察,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迅速接受饶申布士的理论大致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饶申布士强调上帝之国在民间社会中的体现是一种集体性的行动,也是一种群体救赎的行为,他说:“个人福音使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心里有罪,并且使我们相信上帝有拯救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的意愿和大能,但它却未能使我们正确地了解社会秩序的罪恶性,和它对处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的个人罪恶所应负的责任。”^③在饶申布士的理论中,一体性的社会观念代替了个人主义的宗教观,救赎的范围必须扩大,这与中国文化中集体利益行为往往对个人选择权具有优先性的文化传统是一致的。所以中国的学者在理解其理论时都会着意刻画个人与群体的协调关系而力求消弭二者的对立,如张仕章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现在五十万的基督徒当中大半都拘守遗传,着重仪式,只要自己得救,不管邻舍堕落,只求将来天堂底永福,不顾现在社会底生活。”^④按张仕章的看法,集体拯救当然是个人拯救的前提,

① J. Macquarrie,《二十世纪宗教思潮:1900—1980年的哲学与神学之边缘》,何光沪、高师宁译,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2,页212—215。

② 同上。

③ 《饶申布士社会福音集》,赵真颂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56,页4。

④ 同上。

以往所突出的宗教个人性是与中国社会的语境相脱节的,所以基督教的神义中应该容纳世俗社会的规则与秩序。他设定的两个变通公式是:1.“上帝底国”—人道主义—世界主义;2.“十字架”—利他主义—牺牲主义。很显然,宗教规则通过“利他”、“牺牲”等社会原则与中国文化中的群体精神沟通了起来。

第二,饶申布士社会福音理论之所以风行,是因为其基本理念与中国教会的自立与社区化的基本趋向十分吻合。饶氏把“上帝之国”置于民间,实际上在神义论方面混淆了“天上王国”与“地上王国”的界限与圣俗关系,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他强调的“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督化”,显然较易促成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思潮的吻合,因为“上帝之国”与“地上之国”相通的理论为中国教会如何把一种看似缥缈的西方天国幻想简化为中国民众所能接受的世俗形式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支点。但是这一支点的形成却又极易使基督徒在圣俗领域之间乃至在社会场域之内的定位趋于模糊,他们有可能分不清圣俗活动之间的异同关系,或者干脆将二者混为一谈,从而为以后的宗教改革运动留下了难以解决的现实矛盾,这也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分化状态相一致的。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整个社会思潮的总趋势开始从精英转入下层,特别关注农民生活的实际状态,在政教关系与世俗理念上,中国知识层已不是如传教士那样,单单考虑神圣事物如何在世俗世界定位的神学启蒙问题,而是在构想宗教如何被世俗社会所认同所融合的社会学式的问题,这种思维的转化必然导致对神圣意义之本土适应性的广泛质疑。

按照宗教社会学的分析,意义的独特性越鲜明(即神圣世界被表述得越清晰),则所涉及的事件以及适于处理这些事件的知识,越有可能处于相对专门化的社会角色的控制之上;反过来,这种专门

化将会促使人们把实在划分为一个神圣世界与一个日常事物世界,并促使宗教表象与世界观中其他意义领域相分离。^① 饶申布士对神圣事件的表述恰恰与这一程序相反,他对今世生活的强调和对圣俗界限的混淆的最大后果是,上帝之国的秩序很易被理解为是与一般社会组织的功能相同无异,饶氏自己也说:上帝国“拯救社会秩序的能力是以它能否普遍地在社会组织中存在而定”。^② 尽管从根源上而论,饶申布士并非真正放弃对属灵信仰的追求,可是上帝国在社会组织中的象征性存在,却终有可能模糊世俗社区与教会系统的原初界限,甚至二者均被理解为同一性的混合体。正如诚静怡所说:“因为宗教的生活绝不能绝对地划分,它是包含人们全部的生活,如个人、社会、国家会合国际等方面。在这些活动中,没有一种是基督的能力所不能或不该透入的。”^③ 农村教会的领袖余牧人更明确地认为:教会并不只是履行圣职的场所,而要承担起处理世俗事物的功能,由各个社会中基督教机关的领袖,实行建设基督教社会的各种事业。他说:“我诚信教会的设立,决不是专为礼拜上帝和讲道用的,乃是秉着上帝的真道、耶稣基督的教训,改造社会的机关。我诚信教会的领袖工人,决不是每日站在台上讲几句道,就可以完成耶稣基督的圣工的。理想的天国,绝不是用理想可以实现的,乃是人力造成的。我必须亲入各种职业中,现身说法,如耶稣基督当日的态度。”^④ 教会对世俗事物的承担,在乡村教会的领袖们的

① T. Luckmann,《无形的宗教——现代社会中的宗教问题》,覃方明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5,页69。

② 《饶申布士社会福音集》,页4。

③ 诚静怡:《中国基督教的性质和状态》,载林荣洪编:《近代华人神学文献》(以下简称《神学文献》),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86,页337。

④ 余牧人:《基督教改造社会的方法》,《神学文献》,页580。

眼里,已不是托言于宣道的仪式魅力,而是钟情于世俗化的组织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凸现神圣的意义。教会的职能与日常生活畛域之间的界限由此被打破了。

中国的社会福音派虽然直接承受了美国社会福音思潮的影响,在某些理论如宗教与平民之关系方面确能寻到双方共鸣之点,但是中国社会福音派所面临的本土问题毕竟与美式的“社会福音派”有很大不同。美国社会福音派的崛起直接遭遇的是资本主义发展成熟阶段的劳资分化与经济动荡问题,而中国基督教面对的则是远为复杂与多面的挑战。中国基督徒既要缓解内心因反教风潮导致的民族主义与普世教义之间引起的内在紧张,又要处理在世俗社会中如何使基督教重新定位的问题;既要在复杂的中国政教传统的缝隙中挣扎求存,又要在多变的政治漩涡中持守灵性的生命,其生存难度可想而知。

对于中国基督徒而言,“社会福音”在中国得以传播的关键步骤首先是在中国本土的语境下如何再塑基督形象,其次才是基督教在中国基层社会如何重新定位。耶稣到底是一种莫可名状的神启化身抑或只是平民中以悲悯之心共处的一员,正是社会福音派所劈面遭遇的问题。饶申布士曾批评传统神学把上帝属灵化和抽象化的错误,他重塑耶稣形象的方法是区分所谓“祭司的宗教”和“先知的宗教”。“先知的宗教”直接把耶稣等同于富有社会行动之责任的宗教改革家,而不是高悬于众生之上的刻板守旧的职业宣道者。“先知”启迪的直接后果,在于有形地创生出活泼的生活模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慰藉与安抚,个人信仰必须有形化、践履化,这一平民倾向一经引入就立刻被中国基督徒语境化了。

概括而言,中国社会福音派基本上采取了三种重塑耶稣形象的方法:

1. 把耶稣从西方释义学与教会的传统诠释中剥离出来,与中国圣人相比拟,进行文化角色的定位。

2. 把耶稣打扮成“劳工形象”进行社会角色的定位。

3. 把耶稣塑造成“革命家形象”进行政治角色的定位。

这三种角色定位分别采取了三种“形象”设计,第一类形象拥有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表现为极力把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信条相互加以协调,一方面寻觅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intertextuality),另一方面用以证明耶稣在中国本土“此在”的合理性。比如赵紫宸的著作《学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论著,书中分出“国家”、“社会”、“个人”等多种类别,大量引述儒教伦理比附基督教义,通读全书感觉颇似塾中的伦理读本。耶稣“劳工形象”的塑造则是用以证明信仰耶稣的人并非是“吃教者”,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耶稣劳动者形象的刻意强调,也是对“非基督教运动”中普遍把基督教归于资产阶级剥削阵营的观点的一种变通回应。当时的反基督教运动中,有不少言论参酌了美国社会福音派的本意,又兼或受到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极力把基督教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比如1912年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的宣言中,就首先把现代社会组织定义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又认定:“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现代基督教的基督教会。”^①基督徒对此种看法的回应自然是把耶稣形象与资产阶级的剥削形象加以区分,如范定久就完全把耶稣描述为化身于社会中的漂泊者,“一个不是疯子,便是圣人的平常

^① 转引自吕实强:《民初若干教会人士对中国基督教社会使命的看法(1912—1937)》,载林治平编:《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90,页442。

的劳工。”^①吴雷川甚至认为耶稣不但不是资产阶级,而且也无法跻身于中国一般的贵族阶层,他比较孔子与耶稣时说:“孔子不赞成他的门人樊迟请学稼圃,又自以为曾做过大夫的官职,出门就必得坐车;孟子言必称先王,又不以传食诸侯为泰。较之耶的要改革社会专和平民接近,专做于平民有益的工作,显然是不可同年而语。”^②至于对耶稣进行“革命家形象”的角色定位,则更是中国基督徒论辩的一个主题,在下节中我们会加以详细评说。

由上述的观点可知,中国基督徒对耶稣形象的多面塑造基本上是以回应不同类别的世俗思潮为界分标准的,也就是说,“社会福音派”在应对世俗运动的冲击时所采取的策略,基本上可以从再塑后的耶稣形象的特征中加以识别。由此而知,作为一种“宗教表象”的多元形式,对耶稣行迹的诠释已完全泛化为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的标志或符号。余牧人对这种工具意识认识得很清楚:“一切宗教不合理的束缚,因为已经不能应付我们的需要,这也是应当推翻而改造的。”^③同时他又说:“我们承认一切宗教不合理的仪式的束缚,只有修改的必要,而无推翻的可能。”^④对于这种日益工具化的倾向,有的学者曾认为是处理超俗世的上帝与凡俗世界之间的紧张性的一种通道,这又可分疏为内外缘之别;从内缘的角度说,这是一种自觉对《圣经》释义的“第二度创造”(create the second degree),这一过程首先就是要对《圣经》基于犹太人生活与历史情境的“殊别的”(particular)色彩进行消解,把它尽量向普世的解释靠拢。《圣

① 范定久:《基督教的社会使命》,《神学文献》,页 565。

② 吴雷川:《基督教更新与中国民族复兴》,《神学文献》,页 594。

③ 《神学文献》,页 580。

④ 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台湾:久大文化公司,1992,页 239。

《圣经》的普世启示原本难以套入具体的文化语境之中加以处理,但《圣经》具体对政治社会层面教导的模糊性,恰恰使后人的诠释余地有所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争论乃至搜寻《圣经》的原始教义已无意义,它已经从客观意义的层面走到诠释学所谓的主观意义(subjective meaning)的层面。^① 20世纪中国耶稣形象的塑造随着社会变化在不断发生着伸缩,以至于其定位幅度已远远超过了《圣经》的基要原意与范围。与美国社会福音派扮演的清晰角色有所不同,在一个相当广泛的意义上说,中国基督徒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多重动机对耶稣形象的塑造大都可划归“社会福音派”的范围,很难加以严格的界定。当然,奉守基要派灵性生命的原则,否弃耶稣形象之重塑的看法远未在中国绝迹,如流行于二三十年代的基督教奋兴运动就提出了把“社会使命”与教义功能相区别的思想,直接对抗社会福音派的主张,他们认为:“倘若我们专求社会的改良和世界的改造,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达到目的,社会和世界的困难反而加多,因为人心离开上帝,万福的泉源,我们若降基督为改良社会的工具,那就无异于捕风捉影,徒然劳苦,大错而特错了。”^②“现在一切的难题,就是‘国际的不和’、‘社会的不安’、‘经济的不景气’和‘道德的堕落’,这一切问题只有这一个秘诀就能解决,就是从上面来的灵性的新生命,因为追求灵性的奋兴,虽然不想到社会的改良,而社会自然而然的改变了。”^③基督教奋兴运动在当时社会特别是在农村中尽管风行一时,但是从总体格局而言,“社会福音派”渐已成为中国基督教本土运动的主流。

① 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页239。

② 高果能:《教会的复兴》,汉口:汉口圣教印书局,1934,页36—37。

③ 同上。